

中国近代史丛书

洋务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G0J60/10



2 037 8631 3

中国近代史丛书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洋 务 运 动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125 字数 57,000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0

统一书号: 11171·56 定价: 0.18元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一、洋务和洋务派的产生·····	1
二、清朝政府的逐步买办化·····	6
三、洋务派的“求强”活动·····	17
四、洋务派的“求富”活动·····	25
五、建立海军·····	38
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46
七、洋务派的几个集团·····	54
八、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	59
九、早期改良主义者对洋务派的非难·····	67
十、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洋务运动的结局·····	76

一、洋务和洋务派的产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清朝官僚层内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所办洋务，包括对外交涉、通商，编练新式海陆军，开办工厂、矿业、铁路、电报、学堂等等，而购买和仿制洋枪大炮、轮船铁舰，又是所办洋务的中心内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史书，把这些活动称作“同光新政”，意思就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举办的“新政”；又称“自强新政”，以为这是清朝统治者要求“自强”的表现。

在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战败，清朝政府一部分官僚感到他们面临的是一個大变局，如果不谋求对策，反动统治就难以继续下去。他们采取了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路线，来挽救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洋务运动就是这样出场的，所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音桃 táo）、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及在上海一带的部分官僚，就主张承认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以换取外国侵略者的军事援助，镇压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代表清朝政府与英、法侵略者签

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訢(音亦心 yì xīn)、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桂良,和军机大臣兼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人,同外国侵略者挂上了钩,得到了启示,立即上疏说:“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指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把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国内革命,明确地放在第一位。他们还竭力鼓吹遵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信义笼络”。奕訢等人的论调表明,清朝政府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准备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来镇压国内革命。

外国侵略者十分欢迎清朝政府的这一改变,他们用军事进攻的手段迫使清朝政府屈服后,立即转过身来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要征服中国这样一个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民族,要直接统治这样一个国家和人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决定保存和扶持对他们屈服了的清朝政府,以便通过这个政府控制中国,榨取中国人民,建立他们的殖民统治。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明白表示:“新的东方问题之可能发生,是由于中国(指清王朝)的衰弱,而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他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共同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加强清政府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卑鄙思想的指导下,外国侵略者纷纷表示,愿意在军事上帮助清朝政府。法国公使扬言,法国愿意派兵协助清军作战;俄国公使声称,俄国愿意派遣海军进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俄、美两国

并愿意帮助清朝政府，从南方运漕米进京，解决北京因战争封锁而产生的粮食恐慌。外国侵略者愿意直接出兵、出船，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使清朝政府十分高兴。正在皖南祁（音其 qí）门与太平军作战的湘军头子、两江总督曾国藩（音凡 fān），兴奋地对清廷说：外国愿意出兵助战，应该给予“奖励”，并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音殊 shū）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但是曾国藩害怕外国出兵，不仅会分去他的军功，而且还会夺去他的军权，主张暂时不要俄、法等国出兵。清廷也顾虑俄、法、美等国“所贪在利”，担心它们通过协同出兵，提出额外要求，难于应付。

外国侵略者看出，清朝政府对他们立即出兵干涉太平天国革命，还存有一些疑虑，就打算从军备、武器方面支持清朝政府。俄国声称愿意送给鸟枪一万杆、炮五十尊；法国声称愿意卖给清朝政府新式枪炮，并派人教习制造；英国声称愿意卖给清朝政府小火轮船十余号，装备精利枪炮，并愿意派人帮助清朝政府驾驶轮船，管理新式火炮。清军正与太平军在苏、皖、浙三省大战，迫切需要这些新式武器，奕訢和曾国藩便上疏要求购买。特别是曾国藩，他说购买外洋船炮是挽救当时局势的“第一要务”，主张不仅购买，而且要访求智士巧匠，自己制造，用以攻剿太平军，谋求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在这里，曾国藩把学习外国制炮造船的本领，当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救命稻草。洋务运动正是以此为起点，在清朝官僚层内掀起的。

必须指出，向外国学习制炮造船本领的思想，并不始自曾

国藩。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禁烟和抗英的斗争中，看到外国侵略者的军事优势，在于先进的军械火器，便向外国购买过枪炮，又仿照外国船舰式样，试造战船，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外国制造船炮的技术，以抵抗外国侵略者。在他的倡导下，有龚振麟、郑复光、丁守存、潘仕成等一批人，对制造船炮作过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郑复光并把当时取得的造船技术和经验综合起来，写成《火轮船图说》。为了推动这种试制工作，使它变为经常化，林则徐在被撤去两广总督前，曾上疏道光皇帝，要求提用关税银的十分之一，仿造外洋船炮，说“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则制夷已可裕如”。颉颃（音瞞 閼平 軒 mǎn hān）的道光皇帝，竟批为“一片胡言”，扼杀了这个建议。不久，林则徐被革职流放，魏源继起发挥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根据那时能够得到的外国资料，编著《海国图志》一书。认为外国侵略者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三者都应该“因其所长而制之”。林则徐、魏源是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的，他们“师夷之长技”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就是把敌人的“长技”变为自己的，用以对付敌人；而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则是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人民为敌，因此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在奕訢、曾国藩的推动和呼应下，一八六〇年冬，清朝政府一度设抚夷局于北京嘉兴寺，调派满、汉官员轮班到局办公，处理对外交涉。由于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随即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主持洋务的中央机关（详情在下节专述）。

一八六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军械所，为制造船炮的第一所洋务工厂，造了一条身長五十多尺、名叫“黄鹄”的轮船。继安庆军械所之后，淮军头目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雇用“洋匠”制造军火。一八六三年，上海洋炮局随淮军迁移到苏州，成为苏州制炮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湘军另一头目左宗棠，也在杭州试造轮船，但不得法，没有造成。与此同时，湘军、淮军大量购买洋枪洋炮，采用洋法操练，伙同外国侵略者的洋枪队，疯狂进攻太平军。一八六二年五月，法国侵略军军官卜罗德，在奉贤的南桥镇被太平军打死，受到应有的惩处，李鸿章却说：“从此洋人与发逆（指太平天国）仇衅更深，未始非中国（指清王朝）之利，洋务更当顺手矣。”就是说，此后他们更容易结好于外国侵略者，大办洋务了。

随着洋务军事工业的开办，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以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洋务派的出现，表明了官僚、军阀已开始买办化。洋务派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中必然出现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在一段时期内，与那些不赞同兴办洋务事业的封建官僚——顽固派，发生摩擦，形成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洋务派主要以地方实力为基础，随后并演变为几个互相争夺的官僚军阀集团。

二、清朝政府的逐步买办化

清朝政府是一个封建君主绝对集权的腐朽机构。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强烈震撼下，它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它的“天朝尊严”了，以从属关系和自大的态度对待他国已经行不通了，不能不有所变动，以适应新的形势。就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訢、桂良、文祥等在筹办洋务的会奏中，提出了六条调整机构及其职能的建议：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分设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三、管理新开各口的关税，四、处理对外事务时有关将军和督抚相应通知，五、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六、各海口商情和外国新闻纸，应按月上报。但这些建议，不是从吸收新事物、改变旧轨道出发，而是迎合外国侵略者开放中国的要求，所采取的步骤。

一八六一年初，清朝政府正式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办理洋务（外交）的中央机关，简称总理衙门，又简称为总署或译署。由原建议的三个满洲贵族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兼领，自此清朝有关洋务的事，多由奕訢出面主持，文祥从中策划，形成为在中央的洋务派势力。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后来因为他长期和

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勾结外国侵略者，人们称之为“鬼子六”。

总理衙门除由王公大臣兼领、为其首脑外，还调内阁、军机处和各部、院的官员，负责日常工作，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额外章京等名目。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因为这四个国家当时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活动最多，其它先后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而有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摊入四股内，譬如法国股管法国的事外，还要管同荷兰、西班牙、巴西等国有关的事。到一八八三年，又增设了海防股，所管的事包括南北洋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要塞炮台、制造、学堂、电线、铁路、矿业等内容。这些属于军事、工矿以至



总理衙门的一角

文教的项目，怎么会跑到外交机构里去呢？原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是一揽子的洋务新政，要仰赖洋人才能办得起来，所以把内政变成了外交。外交则是向外国侵略者乞讨。他们正在一步步撤去民族的防线。

总理衙门作为一个外交部门，应该是和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相等的。但它不仅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礼部掌管的外交事务，并包办了其它各部同外洋发生联系的业务，如军事、工矿、关税等，这就成了各部的综合机关。而且总理衙门的主持人，例由居于宰相地位的军机大臣兼领，如奕訢既是总理衙门的主管大臣，又是首席军机。因此，总理衙门同军机处的关系，虽无明文规定，事实上是并行的。它已和军机处相似，成为驾于六部之上的另一个最高级机关。这也表明了清朝统治者趋向崇洋，在政制上产生的畸形变化。

总理衙门出现后，外国侵略者也把它看作是为他们“办事”的部门，办得不满意时，便出来干预和指责。一八七五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在“马嘉理案”谈判中，公然当着李鸿章说：自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到今，总理衙门“所办之事越来越不是，就象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甚至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咆哮“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同时，外国侵略者为了加速中国的殖民地化，多做些洋务交易，总是想紧紧抓住奕訢这种人不放。英国公使馆参赞米特福，不加掩饰地写道：“铁路、电报、违背条约等等，这一切老话已经谈过一百次了。恭亲王很烦躁不安，他象一只野兔子似地踌躇、绕圈子、回避。”这些话说明了外国侵略者希望总

理衙门和奕訢做的是什​​么，而总理衙门和奕訢能够做的又是什​​么。

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和外国侵略者的横暴，奕訢、文祥这些号称“识时务”的洋务派头子，已经丧失了自主地办外交的性格，他们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面表现得象只媚态的猫，一面还想偷偷地保留一点封建的虚文。鲁迅曾在一篇题为《说面子》的文章中，刻画出总理衙门的丑态说：“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个故事，说来有点近于戏谑（音虐 nǜe），却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那些封建官僚们的实际状况。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总理衙门的职权也不断扩大，不仅管辖通商、遣使、议和、勘界、借款等事务，凡那时被列为洋务的一切设施，它都得管。只要外国侵略者提出一桩新要求，洋务派增加一个新项目，总理衙门也就增添了新任务。所以总理衙门主办事务的扩展，就是官僚买办化程度的加深。从它开始成立，到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订立后变为外务部的四十年间，正是中国形成为半殖民地的过程。

清朝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设置了南洋、北洋通商大臣。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设有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以管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事务。

这个职位在一八五九年以前，由两广总督兼领，一八五九年以后由两江总督兼领。因为外国侵略势力日益伸向长江，上海已代替广州，成为中外交涉的重心。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增开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和喀什噶尔等地，为通商口岸。地方辽阔，南北口岸相去七、八千里，奕訢认为如果仍归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管理，“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建议在天津设立（北洋）三口通商大臣，专管营口、天津、烟台三口通商事务；其它各口归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驻扎上海。根据奕訢的建议，咸丰皇帝任命署江苏巡抚薛焕兼南洋通商大臣，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为（北洋）三口通商大臣。

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不只限于办通商的事，通商以外的对外交涉都办。同总理衙门不同的是，要他们就地办理对外交涉，免得把事情闹到北京去。但他们对总理衙门不是隶属关系，只是所办的事在上奏皇帝时，也应行文告诉总理衙门罢了。后来由于人事上的更替，并加强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权责，从一八六五年起，南洋大臣改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洋大臣也在一八七〇年起改由直隶总督兼领。因此这两个总督的权势，比其他总督远为突出，长期由湘系军阀、淮系军阀担任，使两江和直隶成为他们在地方倡办洋务、扩展实力的基地。

为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一八六二年又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作为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

在建议设立总理衙门的过程中，奕訢已考虑到，总理衙门

成立后，中外交涉事件势必集中，但中外“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就在要求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要求设立同文馆，培养懂得外国语文的翻译人材。同文馆就是一所外语学校。奕訢准备从八旗子弟中，挑选数十名年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学童入馆学习，以培养成为满洲贵族服务的外交人材。这种排斥汉族地主子弟入馆学习的作法，遭到地方军阀、官僚的反抗。当奕訢要求上海、广东两地的督抚，各代招聘两名通解外国语文的商人，送京充当教习时，两地督抚就回信说“无人可派”，或要价过高，“未便飭令前来”。奕訢只好转请英国公使威妥玛介绍，找到“兼通汉文”的英国人包尔腾任英文教习，条件是每年薪给银一千两。另聘汉文教习徐树琳，每月酌给银八两，一年不到一百两。同为教习，待遇却如此悬殊，这就是同文馆崇外媚外的最初表现。

京师同文馆于一八六二年六月正式开学。最初只有英文馆，以后增加俄文馆、法文馆，一八六六年增设天文算学馆，一八七二年增设德文馆，甲午中日战争后还增设了学习日语的东文馆。由于上海、广州都是重要通商口岸，对外交涉多，需要懂外语的人多，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插手清朝政府的外交活动，更需要培养一批懂外语的人，一八六三年他便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两广总督瑞麟，也于一八六四年在广州设立广州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每年银数千两，从海关的办公费中酌提三成供用。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因此同文馆从一开始就受到赫德操纵。一八六九年，经赫德推荐，聘请美国人